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制度风险偏好视角

严兵¹, 齐凡², 程敏²

(1. 南开大学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2.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境外经贸合作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战略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基于已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文献, 本文利用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2005—2018年相关数据, 实证考察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区位决策。研究发现: 作为特殊的“走出去”模式,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呈现出显著的制度风险偏好; 园区在选址时倾向于较高税率水平以形成园区内外的成本差异; 双边投资协定有助于企业规避风险, 使得企业能够在制度质量较差的东道国选址建园。

关键词: 境外经贸合作区; 区位选择; 制度质量; 双边投资协定

[中图分类号] F2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034(2022)02-0068-19

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 中国各类开发区在工业转型、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关注。构建现代化园区模式进而实现高效产业集聚, 成为了部分欠发达国家想要学习借鉴的“中国方案”。1994年, 时任埃及总统的穆巴拉克在探访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郑重地提出请求, 想让中国开发区的运营者, 作为种子到埃及做出一片这样的区域。1998年, 天津泰达集团受国务院指派代表中国前往埃及建立苏伊士经济区。与此同时, 中国企业也自发开展了海外园区建设的探索, 2002年河南国基集团在塞拉利昂投资建设的国基工贸园区、2003年中国有色集团在赞比亚建立的有色金属工业园区都是企业自发海外建园的典型案例。但在当时, 上述园区的地位与作用仍处于概念阶段, 缺乏明

[收稿日期] 2021-05-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制造业外迁态势、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21AJL001)

[作者简介] 严兵(1977—), 男, 湖北荆门人, 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教授, 研究方向: 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 齐凡(1995—), 男, 天津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 程敏(1996—), 女, 四川成都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

晰的市场定位。相关政策的空白限制了“走出去”活动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洪联英和张云，2011）。随着中国贸易发展，顺差扩大，贸易摩擦加剧，企业对外投资的呼声愈加强烈（李春顶，2008），学界同样支持中国企业主动融入国际市场，大胆“走出去”。当时的中国亟需出台鼓励政策，为中小企业“走出去”开拓国外市场、降低贸易摩擦和规避东道国风险提供支持。就中国宏观经济而言，综合国力的提高、外汇储备的增加和双边经贸合作需求的增加为中国在海外建园提供了现实基础（张广荣，2013）。总体上看，2005年以前，在“走出去”政策鼓励下，中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由企业自发开展实施，以获取外部资源、降低成本和拓展国际市场为导向，以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特区的建设经验为依据，试图寻找境外投资新路径^①。此后，在“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得以快速的发展。截止到2019年年底，中国企业在57个经济体中建有初具规模的园区212家，累计投资超过410亿美元，入驻企业近5400家，在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近37万个，向东道国缴纳税收43亿美元^②。

境外经贸合作区既有助于中国企业抱团出海、抵御风险，也顺应了一些东道国的发展需求。然而，国际上对于中国海外建园的真正意图一直存在质疑，认为中国发展境外经贸合作区除了经济需求，更多的是政治战略的考量，更是拿着个别敏感地区的中国园区大做文章。对此有学者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加以回应（洪联英和张云，2011；林俐和翟金帅，2017），但仅通过个例分析很难有说服力。目前，境外园区总体样本数量超过了200家，这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较规范的实证研究，从整体上对中国境外园区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剖析，通过破解园区选址之谜来对相关质疑进行全面系统的回应。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以李祐梅等（2019）提供的数据集为基础，利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商务部等官方平台修订已有数据集，构建了较完整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微观数据库，丰富了有关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并通过研究发现了境外园区选址与传统OFDI区位决策的显著差异。本文发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偏好于制度质量较差和税收水平相对较高的东道国，并以制度质量和税收成本为切入点继续深入探究，试图找出其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破解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选址之谜。

^①商务部在2005年正式提出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并在2006年6月公布了《境外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基本要求和申办程序》，鼓励企业在境外建设工业园区、科技产业园区等各类经贸合作区。200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同意推进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意见的批复》，通过海外园区建设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2012年，商务部改变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方式，不再采用招标方式，由企业作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主导，先行建设园区，达标后由商务部、财政部考核确认，此举使境外经贸合作区数目激增，截止到2013年年底，境外经贸合作区达到57个。

^②资料来源：<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xwfb/xwrcxw/202001/20200102927745.shtml>（访问日期2021-11-25）。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一) 经贸合作区选址的相关研究

目前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以纺织、家电和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为主,通过与东道国及其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吸引企业入驻,打造开放式的国际园区。加工制造、农业开发和资源利用是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园区的主要类型,其在区位分布上分别呈现出偏好工业基础和产业配套良好的城市区域,口岸和能矿资源丰富区域,劳动力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与农业基础优越区域的分布特点(叶尔肯·吾扎提等,2017)。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政治和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成为了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张金杰,2018)。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产业定位不明确、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以及区位选择扎堆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洪联英和张云,2011)。林俐和翟金帅(2017)通过分析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东南亚地区的运行机制指出,目前当地经贸合作区在数量和区位分布上无法满足未来经济增长的需求,需要做出进一步规划,而科学的规划依据尚未形成。并且在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过程中已经出现园区前期吸引能力弱,大量厂房闲置浪费,以及某些境外经贸合作区定位不明导致重复建设的现象。Bräutigam和Tang(2014)进一步通过采访调查等形式,探究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于非洲国家的影响,发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有助于当地经济转型,带动经济发展,将中国40余年来的改革经验传递给落后国家,并辅之以援助。严兵等(2021)从东道国视角出发,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显著地扩大了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动机以及区位选择的政治意图猜测不绝,但目前尚未有严谨的关于园区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碍于无法获得园区企业层面的数据,目前关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实证研究仅停留在国家层面,无法进行深入挖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李桔梅等(2019)利用爬虫技术,在全网范围搜集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相关数据,汇总得到企业层面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信息。本文在此基础上补充构建了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微观数据库,使得从企业层面研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成为了可能。

(二) 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关于境外经贸合作区区位选择的研究甚少,而OFDI区位选择的研究较为成熟。Kogut和Chang(1991)基于日本制造业企业的直接投资数据,研究发现东道国丰富的技术资源与人力资本是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Buckley等(2007)基于1984—2001年中国企业的OFDI数据研究指出,对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而言,文化距离、市场规模、双边贸易、通货膨胀以及政治风险带来了显

著的正向影响,而东道国当地的资源以及战略要素没有显著影响。Cheng 和 Ma (2007) 利用引力模型研究发现地理距离近的国家或地区对中国的 OFDI 更具有吸引力,且更大的市场规模也带来了积极效应。Cheung 和 Qian (2009) 得出了与 Cheng 和 Ma (2007) 类似的结论,另外还发现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与 OFDI 显著正相关。区别于传统的引力模型,泊松回归模型也得到了重视,如 Ramasamy 等 (2010) 采用中国企业 2006—2008 年的 OFDI 数据进行分类分析,发现私营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倾向大不相同。私营企业的投资动机主要是寻求市场,而国有控股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源禀赋和双边政治关系比较敏感。

目前已有不少关于制度质量影响的研究,但尚未形成统一结论。Globerman 和 Shapiro (2002)、Kolstad 和 Wiig (2012) 等学者的研究支持 OFDI 倾向于制度质量好的东道国的传统观点。Nikolaos Papageorgiadis 等 (2020) 研究了知识产权制度的特征,以及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其研究也支持了 OFDI 偏好制度质量好的东道国的观点。Kolstad 和 Wiig (2012) 则发现了自然资源禀赋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替代作用,如果一国的制度环境不佳,那么其自然资源将对 OFDI 产生积极影响。Ren 和 Yang 等 (2020)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五个维度来衡量国家距离,通过 OFDI 规模决定模型来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选址,结果发现中国的 OFDI 具有很强的自然资源寻求动机,为了获得自然资源,中国企业将克服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在远离中国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三) 假说的提出

企业在进行 OFDI 时多为单独行动,在面临东道国的政治、经济风险时往往独立难支。在面对风险较大的东道国投资项目时,企业更倾向于集群投资来规避风险(余官胜等,2019)。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新模式,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搭建了新平台(李嘉楠等,2016)。可见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企业集体对外投资的占优选择,也是一种特殊方式。因此,在具备传统 OFDI 特征的基础上,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选址可能还会表现出其独特的偏好。

虽然两者在制度风险偏好上的表现可能会存在一致的情况,但背后动因并不相同。基于已有研究,OFDI 制度风险偏好主要是与中国国内的法制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仍有待提升有关,中国企业对于非市场化行为更加熟悉,因而会偏好制度质量较差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这是中国企业作为单一个体,“单打独斗”的投资偏好(Buckley 等,2007; Cheung 和 Qian, 2009; 杨娇辉等,2016)。中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经营的“避风港”,在制度质量较差的地方能够更好地发挥“抱团取暖”的作用,为园区内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因此提出本文假说 1:

假说 1 企业倾向于选择制度质量较差的东道国建立园区。

除却风险规避的作用,境外经贸合作区还能享受到东道国给予园区企业的优惠政策。比如效仿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对外企招商引资时施行的“两免三减半”,在莱基自贸区,税收可以全部免除,园区内的产品在按原材料税率交纳关税后,就可在尼日利亚销售。而单个企业很难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因此园区还能提供给入园企

业降低税收成本的经营优势；在税率较高的东道国或地区，境外园区可以凭借园区内外的税收成本差异来进行招商引资。因此，提出本文假说2：

假说2 企业倾向于选择税率相对较高的东道国建立园区。

除了上述研究，还有学者关注到了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如 Eric 和 Laura（2005）进行定量研究后发现，BIT 可以增加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时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双边投资协定可以对东道国国内制度质量进行弥补。Liesbeth Colen 等（2016）首次尝试研究 BIT 在不同投资领域可能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分析了在中欧和东欧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投资，这些投资分属七个不同的行业。结果发现 BIT 的影响在各个行业之间有很大差异，沉没成本较高的行业中的外国直接投资对 BIT 的签署反应更为强烈。总的来说，BIT 可以弥补制度质量差的劣势、替代制度质量，帮助企业分担风险，促进企业投资建园。因此，提出本文假说3：

假说3 双边投资协定能够增强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国家建立园区的倾向性。

二、数据与模型

（一）数据

2005—2018 年中国境内 196 家企业在 57 个东道国国内投资建立了 212 家境外经贸合作区。本文剔除了在样本期间终止经营以及相关息严重缺失的园区样本，并将少数规模较大园区的子园区合并归为一个大园区。最终本文的数据包含了 2005—2018 年中国境内 180 家企业在 57 个东道国内新建及持续存在的 197 家境外经贸合作区。

本文的数据结构为 180 个企业-年份组合，每个组合均包含多条观测值，每条观测值都表示企业境外经贸合作区选址的一种可能性。参考 Holburn 和 Zelner（2010）的做法，本文每年各个企业对外建园的区位选择范围均由所有样本企业本年以及之前投资建园过的国家和地区组成，因此数据范围会逐年递增，最终共得到 7 684 条观测值。由于只将园区主导企业所选择的国家或地区作为备选样本，可能会使得样本的选择并非随机的，进而产生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为了避免该问题对结果产生干扰，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补齐样本，构建了完整的 57 国与 180 国数据结构，分别得到了 11 172 和 35 280 条观测值。

（二）变量选取

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一种特殊的对外投资方式，目前鲜有文献对其选址因素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本文回顾总结了 OFDI 相关的研究成果，以求尽可能归纳出较为全面的影响因素。

1. 因变量

Y_{ij} 是一个虚拟变量，若主导企业 i 在 t 年选择东道国 j 建园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 自变量

本文分别按照投资动机、营商环境以及双边关系来整理说明自变量选取标准。

(1) 与投资动机相关的变量：本文采用各国每年 GDP 的自然对数来代表东道国市场规模 (ms)；采用东道国人均 GDP 的对数作为国家发展水平 ($counlev$) 的代理变量；以燃料、矿产品出口在东道国总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来衡量东道国自然资源 (nrs) 的丰裕程度，该数据来源于 WTO 贸易统计数据库；采用东道国企业应交税费占利润的百分比来衡量东道国总税率 ($ttax$)；采用东道国当年 FDI 流量与当年 GDP 之比来衡量东道国开放程度 ($open$)，该数据来自 UNCTAD 的 FDI 数据库；采用当年东道国人均专利数量的对数作为东道国科研水平 (ip) 的代理变量。

(2) 与营商环境相关的变量：本文利用 WGI 六项指标的算术平均值来表示当地的制度质量 ($meanwgi$)，数据来源于 World Bank；根据 Kogut 和 Singh (1988) 研究中构建的指数，利用 WGI 六项指标求加权平均构建双边政治法律制度距离 ($insd$)，具体计算方式见式 (1)，其中 i 为东道国， w 为母国， k 为指标， t 为年份， σ_{kt} 分别为上述六项指标的标准差。

$$insd_{it} = \frac{1}{6} \sum_{k=1}^6 \left(\frac{I_{ikt} - I_{wkt}}{\sigma_{kt}} \right)^2 \quad (1)$$

(3) 与双边关系相关的变量：东道国是否与中方签订 BIT ($cbit$) 的影响不容忽视，其作为虚拟变量，签订生效为“1”，反之为“0”。从签订之日算起，若中途出现旧协定作废但启动了新协定，则默认为属于一直签订 BIT，数据来源于 UNCTAD 的 BIT 数据库。自 2013 年起，大量东道国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因此将东道国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br) 纳入考虑，若是沿线国家则为“1”，否则为“0”。

(4) 其他相关变量：采用中国与东道国首都之间距离的对数（以 km 为单位）衡量首都间距离 ($distcap$)，数据来源于 CEPII。以东道国本期汇率和上一期汇率的差值与上一期汇率之比来衡量其汇率波动水平 ($deltabex$)。用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 FDI 存量 ($fdis$) 来衡量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投资往来密切程度，该数据来源于 IMF。

以上未说明数据来源的变量，均源自于 WDI 数据库。

(三)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条件 Logit 模型进行研究。该模型属于定性的个体选择模型，可以研究个体在面临多项选择时，特定因素如何提升某一选项的被选择可能性，其在区位选择问题中被广泛应用。本文中由于园区所处国家的相关变量都是不随园区个体而发生改变的，即只有东道国（即目标地）的特征对区位选择有影响，所以符合条件 Logit 模型的使用条件。

具体而言，本文将潜变量 U_{ijt} 定义为 i 企业于 t 年在 j 国建立园区时可以获得的效用，其中 $U_{ijt} = \beta X_{jt} + \varepsilon_{jt}$ ， X_{jt} 是 t 年 j 国可以观测到的上述自变量所组成的向量， β 为待估系数， ε_{jt} 为无法观测的 j 国特征。当 i 企业于 t 年在 j 国决定建园时概率为：

$$Probit_{ijt}(Y_{it} = j) = \frac{e^{\beta X_{jt}}}{\sum_{k=1}^n e^{\beta X_{kt}}} \quad \forall k \neq j \quad (2)$$

式(2)中, Y 为企业决策, X 为影响因素向量, 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 并对年份与企业固定效应加以控制。

(四) 描述性统计

在正式回归之前, 本文先检验了回归所用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①。WGI 和国家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为 0.74, 为了降低可能的多重共线性, 本文以虚拟变量指标来表示东道国发展水平, 替换掉原有指标: 当东道国为发达国家或新兴经济体时, 赋值为“1”, 其他情况为“0”。其他变量相关系数均较小, 因而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在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见表1), 可以发现各主导企业最终选择的东道国税率普遍较高, 制度质量普遍较差, 且大部分与中国签订了 BIT, 这与前文的假说一致, 前两点发现与大部分关于传统 OFDI 区位选择的研究结论并不相符。

表1 重要变量均值

年份	<i>tax</i>	<i>meanwgi</i>	<i>cbit</i>
2005	87.20	-0.75	0.46
2006	40.45	-0.79	1.00
2007	31.56	-0.72	0.92
2008	53.43	-0.72	0.67
2009	49.77	-0.41	0.78
2010	36.18	-0.88	0.67
2011	42.90	-0.36	0.91
2012	47.34	-0.24	1.00
2013	36.48	-0.21	0.93
2014	41.56	-0.60	0.95
2015	39.44	-0.44	0.95
2016	38.46	-0.45	0.92
2017	33.53	-0.54	0.81
2018	37.77	0.08	0.80
总均值	44.00	-0.50	0.84

三、实证分析

(一) 全样本分析

在基础回归中, 本文利用“逐步回归”法, 将备选变量逐次加入回归, 回归结果展现在表2中。如表2所示, 总体而言, 东道国良好的市场规模、较高开放

^①限于篇幅, 各变量相关系数表留存备索。凡备索资料均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编辑部网站“刊文补充数据查阅”栏目查询、下载。下同。

度、与中国双边的FDI存量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身份均会提高主导企业在此建园的可能性。然而，企业更偏好于在那些政治制度质量较差和税收成本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建园，这与以往有关OFDI制度、成本偏好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说1。虽然也有一些文献认为中国OFDI在选址时存在制度风险偏好特征（Buckley等，2007；Cheung和Qian，2009），但二者背后的动因并不相同。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在东道国经营的“避风港”，需要起到规避风险、抱团出海的作用，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更能突出这一作用。传统的FDI理论提出，较低的税收可以吸引外商投资，园区可以通过实施内部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入驻，相较于园区外部可以得到更低的税收待遇。在税收水平较高的国家更具有税收减免的空间和可能性，所以企业会倾向于前往税收水平较高的东道国投资建园。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choice	choice	choice	choice	choice	choice	choice	choice
<i>lnms</i>	0.225 *** (0.068 4)	0.154 ** (0.071 7)	0.225 *** (0.082 6)	0.333 *** (0.105)	0.234 ** (0.107)	0.210 (0.152)	0.225 (0.149)	0.139 (0.197)
<i>gdpgrowth</i>	0.059 6 ** (0.026 2)	0.060 1 ** (0.028 0)	0.057 1 ** (0.029 1)	0.039 3 (0.035 1)	0.019 8 (0.038 3)	0.007 65 (0.047 1)	0.005 50 (0.049 5)	0.033 6 (0.057 8)
<i>counlev</i>	0.252 (0.188)	0.380 * (0.208)	0.312 (0.213)	0.247 (0.235)	0.150 (0.248)	0.128 (0.430)	0.145 (0.448)	0.547 (0.756)
<i>meanwgi</i>	-0.437 *** (0.112)	-0.394 *** (0.114)	-0.440 *** (0.122)	-0.562 *** (0.154)	-0.542 *** (0.153)	-0.426 * (0.259)	-0.417 (0.275)	-0.742 * (0.380)
<i>ttax</i>	—	-0.003 78 (0.004 42)	-0.003 34 (0.004 70)	-0.015 7 ** (0.007 20)	-0.008 46 (0.007 38)	0.001 81 (0.007 50)	0.001 75 (0.007 44)	0.022 2 * (0.012 2)
<i>open</i>	—	—	0.034 *** (0.012)	0.039 ** (0.016)	0.039 ** (0.016)	0.041 ** (0.020)	0.042 ** (0.020)	0.084 ** (0.037)
<i>fdis</i>	—	—	—	—	0.254 ** (0.111)	0.306 * (0.170)	0.306 * (0.170)	0.288 * (0.169)
<i>distcap</i>	—	—	—	—	—	0.660 (0.416)	0.647 (0.421)	0.892 (0.625)
<i>deltabex</i>	—	—	—	—	—	-0.001 16 (0.010 9)	-0.001 19 (0.010 8)	-0.011 7 (0.010 5)
<i>br</i>	—	—	—	—	—	0.974 ** (0.473)	0.991 ** (0.495)	1.325 ** (0.571)
<i>ip</i>	—	—	—	—	—	—	-0.013 (0.060)	-0.060 (0.080)
<i>elecaccess</i>	—	—	—	—	—	—	—	0.325 (0.482)
<i>totalpartici</i>	—	—	—	—	—	—	—	0.000 89 (0.012 7)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 431	6 718	6 718	4 967	4 967	2 954	2 954	1 600

(二) 异质性分析

1. 企业类型

为了进一步研究微观企业在园区选址时的偏好差异, 本文根据企业股权占比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所用数据中两者占比分别为 38% 和 62%。根据以往研究, 相较于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市场化程度更高, 会表现出更明显的逐利行为 (Ramasamy 等, 2010)。

如表 3 所示, 第 (1) 列和第 (3) 列分别为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国有企业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偏好特征, 这是因为国有企业所主导的园区项目多以两国间协议为导向, 或者受东道国邀请, 将中国的园区经验复制到当地, 因而并未呈现出显著的市场化特征。民营企业则偏好于在市场规模较大, 开放程度较高, 与中国地理距离较近的地区建园。并且在回归结果中, WGI 平均值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民营企业会更加看重园区规避风险的优势, 通过在制度质量较差的东道国建立园区, 以期为园区内入驻企业提供适宜的营商环境来招商引资, 这与本文在基准回归部分的发现一致。表 3 的第 (2) 列和第 (4) 列在控制了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之后, 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 3 异质性分析之分企业类型

变量	(1)	(2)	(3)	(4)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
<i>meanwgi</i>	-0.312 (0.227)	-0.301 (0.224)	-0.559*** (0.203)	-0.479** (0.232)
<i>ttax</i>	0.000 634 (0.004 40)	-0.000 385 (0.004 25)	0.009 53 (0.006 05)	0.003 80 (0.003 8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 184	1 584	3 379	2 124

2. 投资动机类型

企业在园区选址决策时, 存在多种投资动机。本文通过构建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制度质量的交互项, 来研究企业出于不同动机建立园区时的制度风险偏好, 结果如表 4 所示。在第 (1) 列中, 市场规模与制度质量的交互项 (*wgims*) 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企业在面对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时, 更倾向于在那些制度质量较差的地区建园; 在第 (2) 列中, 结果类似, 交互项 (*wgicl*) 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企业在国家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道国建园时, 更加倾向于在制度质量较差的地区建园。在

第(3)列和第(4)列中,本文通过分别构建东道国研发投入与制度质量的交互项(*wgird*)和专利数量与制度质量交互项(*wgiip*)来研究企业出于科研动机投资时会有怎样的制度风险偏好。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科研水平较高的地方,企业会更倾向于在制度质量较差的地区建园。本文认为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是,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主要作用正是为区内企业提供保护、维持良好的运营环境,只有在制度质量相对较差的地区建园才能有效发挥“避风港”的作用,吸引更多企业入园。关于地区科研与制度质量的关系,已有学者(李应博和殷存毅,2018)通过经验分析证明良好的制度质量对当地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本文的检验结果提供了支持。

表4 异质性分析之分投资动机类型

变量	(1)	(2)	(3)	(4)
	市场规模	国家发展水平	研发投入	专利数量
<i>meanwgi</i>	5.526*** (1.909)	-0.104 (0.221)	0.172 (0.294)	0.394 (0.313)
<i>wgims</i>	-0.223*** (0.0721)	—	—	—
<i>wgicl</i>	—	-0.517** (0.244)	—	—
<i>wgird</i>	—	—	-0.543** (0.261)	—
<i>wgiip</i>	—	—	—	-0.110*** (0.036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566	5566	2217	5566

3. 园区类型

根据园区的主导产业可将园区划分为六种类型:农业开发型、加工制造型、商贸物流型、技术研发型、资源利用型和综合发展型。在此,本节将研究不同园区类型是否存在不同的制度风险偏好,以综合发展型园区为基准生成虚拟变量,将生成的虚拟变量与东道国制度质量(*meanwgi*)进行交互,来观察回归系数的符号。由表5的第(1)列和第(2)列可以看出,农业型与加工型园区在选址时存在着显著的制度风险偏好特征,而在其他类型园区并不存在这一特征。第(6)列通过将所有交互项一同放入回归对上述结果加以验证,发现结果具备稳健性。

表5 异质性分析之分园区类型

变量	(1)	(2)	(3)	(4)	(5)	(6)
	农业型	加工型	商贸型	技术型	资源型	总体回归
<i>wginy</i>	-0.543** (0.242)	—	—	—	—	-0.503** (0.284)
<i>wgijg</i>	—	-0.581** (0.234)	—	—	—	-0.450*** (0.260)
<i>wgism</i>	—	—	-0.077 (0.358)	—	—	-0.061 (0.360)
<i>wgijs</i>	—	—	—	0.056 (0.290)	—	-0.153 (0.336)
<i>wgizy</i>	—	—	—	—	0.311 (0.417)	0.155 (0.444)
<i>meanwgi</i>	—	—	—	—	—	-0.170 (0.18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 566	5 566	5 566	5 566	5 566	5 566

(三) 机制检验

为了进一步探究园区与 OFDI 选址背后存在的机制差异, 本文检验了两种重要因素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

1. 总税率与制度质量的交互作用

正如在描述性统计与基准回归中所示, 见表6第(1)列,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选择往往偏好于制度质量较差、税收水平较高的东道国。本文通过引入两者的交互项, 检验制度质量在选址时所起到的调节作用, 回归发现 $meanwgi \times ttax$ 的系数显著为负, 这说明在制度质量较差的情况下, 主导企业倾向于在税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建园。这是因为在税率较高的国家, 在制度质量较差的情况下, 园区可以拥有更大

表6 机制检验之总税率的作用

变量	(1)	(2)	(3)
	<i>choice</i>	<i>choice</i>	<i>choice</i>
<i>meanwgi</i>	-0.742* (0.380)	0.281 (0.512)	-0.462 (0.354)
<i>ttax</i>	0.0222* (0.0122)	0.00953 (0.0128)	0.0762* (0.0408)
<i>meanwgi \times ttax</i>	—	-0.0277*** (0.0103)	—
<i>ttax</i> ²	—	—	-0.000887* (0.00045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 600	1 600	1 600

的谈判和议价空间来降低税收，获得园区内部的税收优惠，使得园区内外形成税收差异，因此拥有了降低税收成本的优势，吸引企业入园投资。

需要注意的是，税率并非越高越好。本文通过引入总税率的平方项进行了 U 型检验 [见表 6 第 (3) 列]，发现当税率不超过 42% 时，东道国税率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加园区内外部的税收成本差异优势，对于企业建园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倒 U 型关系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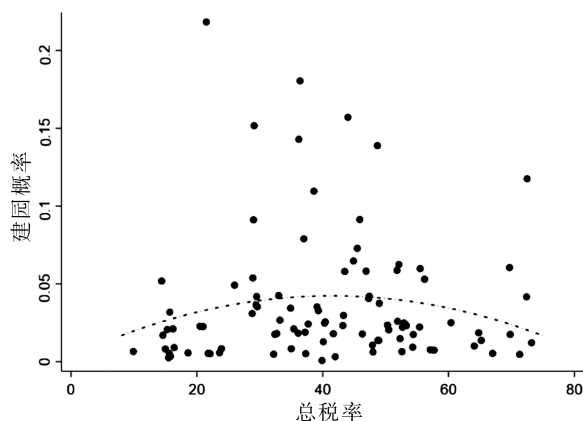


图 1 总税率的倒 U 型作用

2. BIT 的风险规避机制

在前文中，本文提出了假说 3：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为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提供保障，使园区企业有能力承受更大的风险，从而能够增强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国家建立园区的倾向性。在描述性统计部分发现园区选择的东道国基本均与中国签订了 BIT，假说 3 得到了初步验证。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假说，本文进行了如下检验。

如表 7 所示，在前两列，本文按照东道国是否与中国签订 BIT 为标准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发现在签订了 BIT 的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前往制度质量较差的东道国建立园区。因此，本文在第 (3) 列引入了 $cbit \times meanwgi$ 交互项，回归结果显著为负，这说明 BIT 的签署可以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提供投资保障，抵御更大风险，使得企业能够前往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建园，调节效应成立。考虑到政策签订的时滞性，第 (4) 列展示出了 BIT 滞后一期与 WGI 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显著性与方向并未改变，与假说 3 一致。为了进一步验证 BIT 风险规避机制结果的稳健性以检验假说 3，本文进行了如下检验。本文制度质量作为一项平均指标，是由六项子指标经算术平均计算得到，具体指标包括东道国的腐败控制力度 (*corruption*)、政府效率 (*government*)、政治稳定性 (*political*)、法治水平 (*ruleoflaw*)、话语权与问责制 (*voice*) 以及制度质量 (*regulat*)。进而将上述指标分别进行交互回归 (见表 8)，最终六项分类中有五项结果是显著的，说明 BIT 的签署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为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提供保障，提升了企业和园区抵御东道国经济政治风险的能力。

表7 引入BIT滞后一期的交互项

变量	(1)	(2)	(3)	(4)
	BIT=1	BIT=0	交互项	滞后一期交互项
<i>meanwgi</i>	-0.571** (0.251)	2.255 (3.105)	1.458* (0.814)	0.209 (0.403)
<i>cbit_t × meanwgi</i>	—	—	-0.353** (0.139)	—
<i>cbit_{t-1} × meanwgi</i>	—	—	—	-0.868** (0.40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 188	44	5 566	5 530

表8 考察制度的六项分类指标

变量	(1)	(2)	(3)	(4)	(5)	(6)
	choice	choice	choice	choice	choice	choice
<i>corruption</i>	0.111 (0.399)	—	—	—	—	—
<i>cbit_{t-1} × corruption</i>	-0.742* (0.397)	—	—	—	—	—
<i>government</i>	—	0.427 (0.530)	—	—	—	—
<i>cbit_{t-1} × government</i>	—	-0.887* (0.529)	—	—	—	—
<i>political</i>	—	—	0.777* (0.436)	—	—	—
<i>cbit_{t-1} × political</i>	—	—	-0.827* (0.435)	—	—	—
<i>ruleoflaw</i>	—	—	—	0.158 (0.338)	—	—
<i>cbit_{t-1} × ruleoflaw</i>	—	—	—	-0.757** (0.347)	—	—
<i>voice</i>	—	—	—	—	-0.0463 (0.317)	—
<i>cbit_{t-1} × voice</i>	—	—	—	—	-0.381 (0.288)	—
<i>regulat</i>	—	—	—	—	—	0.543 (0.352)
<i>cbit_{t-1} × regulat</i>	—	—	—	—	—	-0.963*** (0.37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 683	5 683	5 683	5 683	5 683	5 683

四、稳健性检验

(一) 替换指标

1. 制度距离

在前文的回归中，本文用 WGI 的平均值来衡量制度质量，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制度距离替换这一指标（Kogut 和 Singh，1988）以衡量东道国与中国之间制度水平的相对差异，指标具体的构建方法见变量选取部分式（1）。由于制度质量是一个平方项，需要为其赋予方向，倘若东道国制度质量大于中国则为正号，反之为负号。与机制检验中表 6 和表 7 的变量构建方法一致， $cbit_{t-1} \times insd$ 为中国和东道国是否签署 BIT 的滞后一期与制度距离的交互项， $ttax \times insd$ 为东道国税收水平与制度距离的交互项。如表 9 第（1）列所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签订 BIT 的情况下，主导企业会更加倾向于前往比中国制度质量更加需要提升的东道国建园；第（2）列中显著为负的系数说明在制度质量不如中国的国家里，主导企业会更加偏好前往税收较高的国家建园，从而获取更大的议价空间。上述发现与原有结论相符，说明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9 替换制度质量指标和修正为 BIT 生效时间

变量	(1)	(2)	(3)	(4)	(5)
	choice	choice	生效=1	未生效=0	机制检验
$cbit_{t-1} \times insd$	-0.187* (0.105)	—	—	—	—
$ttax \times insd$	—	-0.00461* (0.00255)	—	—	—
$meanwgi$	—	—	-0.818** (0.330)	-1.120 (0.716)	-0.023 (0.293)
$l_fbit \times meanwgi$	—	—	—	—	-0.837** (0.33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 278	2 809	3 051	248	5 392

2. BIT 的生效时间

用 BIT 的签订时间作为识别标准，由于 BIT 的签订与生效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本文将 BIT 的签订时间替换为生效时间， l_fbit 为 BIT 是否生效的滞后

一期变量。结果见表9第(3)列、第(4)列和第(5)列。在第(3)列中,制度质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而第(4)列的系数不显著,说明BIT生效后可以提升园区内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第(5)列中BIT生效的滞后一期与制度交互项($I_fbit \times meanwgi$)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该结果是稳健的,且BIT的调节作用依旧稳健。

(二) 扩大样本

由于各种难以观察到的潜在因素可能会导致某年企业并不会去某一东道国投资建园,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干扰回归结果,本文在基准回归部分采用了备选方案——逐年递增的数据结构(Holburn和Zelner,2010)。为进一步避免样本选择问题,本文将样本补齐得到两类数据结构:一种是使得每年各主导企业都会面对57个东道国作为备选方案进行选择,样本数量为11172条;另一种是将全球各国作为每年主导企业建园的备选方案,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最终汇总得到180个国家样本,样本数量为35280条,基础回归结果在此仍然稳健,并且各变量显著性有所加强^①。

五、拓展分析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选址行为在制度环境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风险偏好倾向,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一现象,除了上文进行的机制检验,本文还利用前人对于OFDI制度风险偏好的研究结论解释背后的原因。

Hajzler(2014)强调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因素会扭曲OFDI制度风险偏好。这里的制度风险偏好单纯是指一种偏好,扭曲是指从厌恶(*aversion*)变成偏好(*preference*)。Kolstad和Wiig(2012)认为中国的OFDI尤其如此,从而表现出制度替代现象,即中国的OFDI会在自然资源丰裕度与制度环境之间做出取舍。也有学者(Habib和Zurawicki,2002;Bénassy Quéré等,2007)提出“制度接近性”观点,即中国OFDI在选择制度质量相近的东道国时能更好地分散风险,适应当地的营商环境。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利用自然资源与制度质量的交互项和制度距离的平方项,分别检验在境外经贸合作区选址时是否存在“自然资源扭曲”以及“制度距离接近”现象。对于前者,本文将研究需要在自然资源禀赋与制度禀赋之间权衡取舍的时候,园区会做出何种选择。对于后者,类似于对税收的倒U型检验,本文试图去研究,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更加偏好怎样的制度距离。

表10中第(1)列展示的是“自然资源扭曲”假说检验,第(2)列和第(3)列是“制度距离接近”假说检验。制度质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自然资源与制度质量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说明园区选址时确实是制度风险偏好的,不过这种风险偏好会随着东道国自然资源丰裕度上升而下降,且有可能与传统OFDI偏好相似,呈现出风险规避特征。制度距离的平方项显著为正,在进行U型检验后发现U型关系成立,这说明园区选址既具备与OFDI选址相同的制度距离接近偏好特征,也具备与OFDI不同的特点,即园区选址也偏好于制度距离大且制度质量较

^①篇幅所限,回归结果留存备案。

差的东道国。因此,本文认为自然资源禀赋会扭曲园区的选址决策行为,如果园区在选址时自然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园区的风险偏好特征甚至会转变成风险规避;另外主导企业会选择制度质量接近中国或者远差于中国的国家或地区投资建园,此时更能凸显园区规避风险的优势特征。

表 10 “自然资源扭曲”与“制度距离接近”检验

模型扩展 变量	“自然资源扭曲”检验		“制度距离接近”检验	
	<i>choice</i>		<i>choice</i>	
<i>meanugi</i>	-0.787*** (0.242)	—	—	—
<i>ttax×meanugi</i>	0.00881** (0.00415)	—	—	—
<i>insd</i>	—	-0.388*** (0.125)	-1.155*** (0.292)	0.154*** (0.051)
<i>insd²</i>	—	—	—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 566	5 719	5 719	5 719

六、结论与建议

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中国对外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境外经贸合作区不仅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避免企业单打独斗、减少经营风险,推动产业升级,促进了中国的出口,也为当地创造了数量可观的就业岗位与收益。然而,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发挥重要经济作用的现实不匹配的是,目前针对境外经贸合作区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凤毛麟角。本文对目前的研究成果加以补充和拓展,回应了外界关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诸多质疑和猜测,也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具体来说,本文得到了如下结论:

与传统的 OFDI 研究一致,市场规模大、开放程度高的经济体对于企业建园更具吸引力。而与以往 OFDI 研究不同的是,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到制度质量差的国家或地区建园。不同投资动机的研究表明,园区在制度质量相对较差的环境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点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会更加看重园区规避风险的优势,通过在制度质量较差的东道国建立园区,为园区入驻企业提供适宜的营商环境来招商引资。除此之外,企业建园选址时还要考虑是否具有“议价空间”,利用较差的制度环境降低税收、

抱团取暖，因此往往倾向于去税收相对较高的东道国建立园区。不仅如此，园区抵抗风险的能力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在企业为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选址的过程中，双边投资协定规避制度风险的机制作用突出，即BIT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使园区企业有能力承受更大的风险，从而能够增强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国家建立园区的倾向性。最后，自然资源禀赋会扭曲园区的选址决策行为，如果园区在选址时自然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园区的风险偏好特征甚至会转变成风险规避；主导企业会倾向于选择制度质量接近中国或者远差于中国的国家或地区投资建园，此时更能凸显园区规避风险的优势特征。

受新冠疫情冲击，全球政治经济局势风云万变。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应发挥其应有作用，帮助企业分担风险，缓解企业经营压力。基于此，本文具体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建立园区前应科学合理地进行布局。选择开放程度较高、存在税率议价空间的东道国建立园区，如果面对可供选择的尚未建立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东道国，应首选在制度质量较差的地区投资建园，充分发挥园区的“避风港”作用。其次，建园后应强化风险防范措施。为了进一步提升园区抵御风险的能力，应以政府有关部门为主导，团结法律服务机构、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多方面机构定期评估园区经营风险，对相应风险制定对策方案。同时，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协商中，加大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保护力度，为中国企业在制度质量更差的东道国建园提供政策支持。再次，应长期坚持合作区投资模式。与当地政府合理有效沟通，积极鼓励吸引当地企业入园，针对疫情受损严重行业或地区提供防疫专项补贴，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面对全球卫生突发事件挑战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最后，应有效利用“一带一路”投资促进平台。“一带一路”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中国与沿线各国提供了丰富的投资贸易机会，中国应有效利用这一机会，加大园区建设力度，实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的创新，并为东道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实现共赢。

本文初步探究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区位选择问题，研究的精度和深度尚存不足。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进一步完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选址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实证分析来对比其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异同，得到更为准确的选址参考，进而揭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中国特色。二是随着境外经贸合作区数据可得性的提升，在完善相关数据的基础之上，构建一套较为全面的指标体系，考虑一些难以量化指标的度量方法，如东道国社会治安、两国政治关系等。另外，也需要对合作区建设后的经贸效应进行细致和准确的因果识别，对经贸合作区的绩效进行量化评估。三是在区域合作的背景下，思考如何有效利用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来承接“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红利，实现二者的双向联动。在新形势下，研究“一带一路”布局如何带动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可持续发展，以“一带一路”的“五通”为机制，规划合作区未来的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 [1]洪联英,张云.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与企业“走出去”战略[J].国际经贸探索,2011,27(3):48-54.
- [2]李春顶.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与中国企业“走出去”[J].国际经济合作,2008(7):25-28.
- [3]李嘉楠,龙小宁,张相伟.中国经贸合作新方式——境外经贸合作区[J].中国经济问题,2016(6):64-81.
- [4]李祐梅,邬明权,牛铮,等.1992—2018年中国境外产业园区信息数据集[J].中国科学数据(中英文网络版),2019,4(4):68-78.
- [5]李应博,殷存毅.“制度质量”会影响地区创新能力吗——以台湾地区为例[J].国际经济评论,2018(1):143-154+8.
- [6]林俐,翟金帅.“一带一路”沿线境外经贸合作区运行机制及空间布局——以东南亚区域为例[J].当代经济,2017(2):112-114.
- [7]叶尔肯·吾扎提,张薇,刘志高.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海外园区建设模式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32(4):355-362.
- [8]严兵,谢心荻,张禹.境外经贸合作区贸易效应评估——基于东道国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1(7):119-136.
- [9]杨娇辉,王伟,谭娜.破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J].世界经济,2016,39(11):3-27.
- [10]余官胜,范朋真,龙文.东道国风险、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度量与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J].国际商务研究,2019,40(2):15-25.
- [11]张广荣.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政策探析[J].国际经济合作,2013(2):40-42.
- [12]张金杰.中国境外经贸园区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与经验总结[J].经济纵横,2018(7):52-58.
- [13]BÉNASSY QUÉRÉ A, COUPET M, MAYER T.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The World Economy, 2007, 30(5): 764-782.
- [14]BRÄUTIGAM D, TANG X Y. “Going Global in Group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Overseas[J]. World Development, 2014(63): 78-91.
- [15]BUCKLEY P J, CLEGG L J, CROSS A R,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 499-518.
- [16]CHENG L K, MA Z.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R]. Working Papers, 2007.
- [17]CHEUNG Y W, QIAN X. Empirics of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J].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09(3): 312-341.
- [18]ERIC N, LAURA S. Do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Increa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J]. World Development, 2005, 33(10): 1567-1585,
- [19]GLOBERMAN S, SHAPIRO D. Glob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The Role of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J]. World Development, 2002, 30(11): 1899-1919,
- [20]HABIB M, ZURAWICKI L. Corrup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2, 33(2): 291-307
- [21]HAJZLER C. Resource-based FDI and Expropriation in Develop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4, 92(1): 124-146.
- [22]HOLBURN G L, ZELNER B A. Political Capabilities, Policy Risk,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trategy: Evidence from the Global 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Industr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31: 1290-1315.
- [23]KOGUT B, CHANG S J.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1, 401-413.

- [24] KOLSTAD I, WIIG A.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 47(1): 26-34.
- [25] KOGUT B, SINGH H. The Effects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 411-432.
- [26] LIESBETH C, DAMIAAN P, ANDREA G.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FDI: Does the Sector Matter[J]. *World Development*, 2016, 83: 193-206.
- [27] NICKOLAOS P, FRANK M, WANG C G, et 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gimes: How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Affect Outward FDI Location[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20, 29(1): 194-203.
- [28] RAMASAMY B, YEUNG M, SYLVIE L.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0(10): 1-9.
- [29] REN X Y, YANG S L. Empirical Study on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OFDI[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 61:101428.

Research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China's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Risk Preference

YAN Bing¹, QI Fan², CHENG Min²

(1. Center for Transnationals'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China's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 (OETCZs) are important platform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go global".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OETCZs in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been further enhanced. Based on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literature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d the location choices of OETCZs by using the compiled data of China's OETCZs from 2005 to 2018. We find that as a special "going global" mode, OETCZs show a significant institutional risk preference. China's OETCZs prefer higher taxation levels to form a cost advantage within the zones. Furthermore,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could help enterprises avoid risks, which enable them to build zones in host countries with relatively poorer institutional quality.

Keywords: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 (OETCZs); Location Choice; Institutional Quality;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责任编辑 武 齐)